



杨兴锋 江艺平 ◎主编

南方报业

是如何讲故事的

新闻背后的新闻 新闻冰山下的声音

本书不仅呈现了南方报业记者对采访技巧的理性思考，
而且向读者展示了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曲折而又难忘的人生经历。

罗永新 吴自力 ◎编选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南方报业

是如何讲故事的

杨兴锋 江艺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方报业是如何讲故事的 / 杨兴锋, 江艺平主编 ; 罗永新, 吴自力编选. —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491-0542-7

I. ①南… II. ①杨… ②江… ③罗… ④吴… III. ①报纸—新闻工作—广州市 IV. ①G219.24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2332 号

南方报业是如何讲故事的

杨兴锋 江艺平 主编 罗永新 吴自力 编选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3000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3000503 读者热线: (020) 83000502

网址: <http://nf.nfdaily.cn/press/>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言

读懂复杂中国的智慧实践

展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媒体领域的一大变革是，一批市场化媒体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力量诞生。若干市场化媒体最终能够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裹挟之下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就是依托它所生产的新闻的品质。一篇稿件的质量，重要的衡量标准在于它对转型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的推动作用，如果再进一步说，在于它在保证每一个公民权利和生命尊严方面的力量。2003年《南方都市报》“孙志刚”案的报道之所以取得如此好的社会效果，原因就在于它是以新闻专业主义指导下的调查性报道而站在国内媒体的前沿。

深受国人期待的媒体舆论监督通常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通过报道海量的信息，让公众知道权力是如何运用，并使权力运作透明化。第二种就是调查性报道，媒体对事件做深度报道。这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监督。调查性报道影响很大，但费时、费力、风险大。第三种监督形式就是媒体发表意见，刊登各种评论，对权力滥用以及相关的现象做抨击、揭露，依托报道从个案中有所升华。

2008年6月22日，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发表讲话时把我国当下的媒体划分为三种：官媒、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在这三类媒体中，毋庸置疑，对权力起到监督制衡作用的往往是都市类媒体和网络媒体，而囿于网络媒体没有采访权，只能在转发放大舆论效果上发挥强大的作用，所以真正的采访报道还要来源于都市类媒体。都市类媒体要真正承担公民社会“主心骨”的责任和力量，最终绕不开以上三种舆论监督形式。在这三种形式中，而尤以调查性报道最为当下中国人所瞩目。

调查性报道对当下中国的改革之所以管用和必要，原因在于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每当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人

们在追逐公平正义的过程中，最希望得到的就是事件的真相。乌坎事件的妥善解决就是明证。在媒体和公众舆论的追问和倒逼下，广东省委省政府最终承认了人们维权行动这一事实合情合法，从而促成事件向良性方向发展，任何扭曲真相的说法都可能促使事件向负面效果发酵。所以说，未来中国是调查性报道的天堂，这一说法并不为过。

调查性报道以深度挖掘真相、还原真相为己任。调查性报道之所以费时、费力、风险大，核心的原因在于获取真相的难度极大。引用书中的话就是，“一次重大新闻事件的调查报道，对于记者来说，无异于一场重大战役”。“潜伏富士康”报道、“77元廉租房”报道、“山西黑砖窑”报道、“汉芯造假事件”报道等在调查取证上无不如此。正因为有这么大的难度，真相的获取和还原也才是调查性报道的魅力所在。

那么，究竟怎样去挖掘和还原真相，这是个需要去做经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但得到学界共识的应该是，在挖掘和还原真相上必须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只有在专业调查和取证的基础上，所呈现的事实才能够被人们所信服。新闻专业主义的打造和形成离不开两股力量，一种是他律的力量，来自于新闻法制。一种是自律的力量，来自于新闻伦理。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如果自律作用不成，他律的作用必然就要介入，这种介入又和新闻自由是矛盾的。因此，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更应该依靠于媒体自身对伦理和规范的坚守。

本书中一些一线的调查记者和学者，从媒体法制和媒体伦理的角度，对新闻媒体究竟该如何挖掘和还原真相做出了实践性的回答。例如，傅剑锋从法制和伦理结合的角度，对富士康诉一财案做出了思考，在媒体的专业主义上提出了策略性的建议。这就是媒体的自律不成，必然导致他律介入的必然结果。这让读者想起了最近发生的“达芬奇”案中案，这也是媒体在资本的诱惑面前丧失职业伦理的典型案例。

在书中，记者们更多地是从媒体伦理的角度对新闻专业主义做出了思考。《邓玉娇案，一个记者的立场》、《警惕媒体与民意的断裂》、《黄健翔报道检视》、《许霆案：热点新闻我们该做什么？》、《现实的困境和媒体

的选择——谈黄静案报道》、《〈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天地广阔——我写重庆钉子户报道的两点体会》、《窦唯与八卦焦虑症》等。这些文章在向我們展示并回答了报道该如何平衡、客观、公正、准确等问题。这些都是新闻专业主义操作过程中重要且容易犯错之处，特别是在当下自媒体时代，信息多元化在拓展话语空间的同时，也给传统新闻报道带来了难度。

通读本书，发现书中不仅呈现了记者们对采访技巧的理性思考，而且向读者展示了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辛酸而又难忘的人生经历。无论是理性思考的阐述还是采访经历的回顾，都撇开了宏大叙事，在细节处体现记者对新闻的执着与坚韧。也让我们感受到媒体法制和媒体伦理的研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与推动作用之巨大。此外，南方报业的撰稿人素来注重文本的精粹，在厚重题材中展现生花妙笔，这也是南方报业的一个招牌。

对于新闻传播学界来说，本书是连接学界和业界的一座桥梁，书中一线记者们讲述的采访经历和体会以及自己对问题的思考，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学界也应该多和业界的记者们互动沟通，这样学界研究的问题才能引起业界的关注和反思，才能从业界得到超出本书以外的一些宝贵的研究资料。

本书的作者，已经离开南方报业不乏其人，有的踏进新媒体探索新路，有的成了独立专栏作家，更多的转入其他媒体担任要职，将南方报业的血液和基因带入更多的报刊，影响了大江南北的新闻实践，带动了新闻专业主义在国内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本书不仅是一线记者学习的案头书，而且是立意做深度报道记者、特别是调查性报道记者的有志之人必备的一本活教材，同时也是学界了解业界，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必备的参考书。愿本书的出版在以上这些方面发挥它应用的价值。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目 录

序言 读懂复杂中国的智慧实践 / 1

第一章 为真相我们一直在路上 / 1

这是来自新闻第一线的“作战报告”。一次重大新闻事件的
调查报道，对于记者来说，无异于一场重大战役。本章将告诉你
记者是怎样的小心求证、步步为营。为真相，我们一直在路上。

“潜伏富士康”报道出台始末 傅剑锋 / 2

一个“卧底”的“自白书” 刘志毅 / 8

南都“77元廉租房”报道始末 彭美 / 14

读者，媒体的敌人之一 杜强 / 19

关于乡村女教师卖身供弟上学的采访经历 傅剑锋 / 22

模糊的伤口 杨瑞春 / 28

山西黑砖窑采访全记录 朱红军 / 35

于幼军的选择和媒体的责任 林楚方 / 46

第二章 来自新闻冰山下的声音 / 49

这是来自新闻冰山下的声音，是新闻背后的新闻。这里将揭示新闻真实之后的真相。新闻往往会遭遇许多不确定因素的狙击，于是许多精彩变成了“沉没的声音”。这里，正试图打捞点上来。

曾十面埋伏过，孤独感不赤裸

——关于汉芯造假事件的记者手记 杨琳桦 / 50

作为记者工具的blog 左志坚 / 57

《系统》采访幕后 曹筠武 / 62

《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社保案幕后 左志坚 / 69

瞧，好选题在这里！ 吴晨光 / 76

我如何“侦破”《神雕之死》 傅剑锋 / 80

那些你视而不见的真相

——《谁杀死了李丽云》报道背后 柴会群 / 89

李丽云事件：《南方周末》与《时代周报》的技术性分析

周海燕 / 98

第三章 坚持立场还是顺应民意 / 107

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民意是一杆秤，它度量着媒体的善恶优劣。但
对一个经过详细调查、明晰事件来龙去脉的记者而言，假如民意是错误

的，是矫枉过正的，媒体该如何适从？是坚持立场，还是顺应民意？面对这种困惑，南方报业的记者以报道作出自己的回答。

邓玉娇案，一个记者的立场 龙志 / 108

警惕媒体与民意的断裂 黄秀丽 / 123

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蒋志高 / 131

我让一个人重温了一遍悲剧 林珊珊 / 137

有弱点，更有灿烂光彩 李海鹏 / 147

为“新闻价值”遗弃了的人做点什么 杨继斌 / 150

“渭南书案”是言说权利的胜利 上官敦铭 / 155

第四章 新闻江湖的自我检视 / 161

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认可的符合新闻伦理道义的事，但不要试图站上道德的制高点。好的记者，要敢于榨出自己衣服里面藏着的那个“小”。

从孙志刚、黄静到躲猫猫案的网络舆论 王雷 / 162

我没有轻率过，我态度认真得很 吴虹飞 / 170

黄健翔报道检视 陈海 / 177

一次新闻专业主义的大讲堂

——富士康诉一财案的思考 傅剑锋 / 185

与地震有关的“江湖” 马昌博 / 194

许霆案：热点新闻我们该做什么？ 杨晓红 周皓 / 202

窦唯与八卦焦虑症 钊江明 / 209

行走江湖，安全第一 杨学涛 / 212

第五章 沟通是采访的最高技巧 / 217

成功的报道总是相似的，失败的报道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鲍小东说，世事多艰，多少采访都必须如此曲曲折折地进行，从外围渐渐逼近核心；其实，采访并无技巧，只有沟通。

想象最坏的结果，规划采访方案 鲍小东 / 218

讲述唐山心灵成长

——唐山地震30年报道记者手记 南香红 / 225

《南方周末》“加沙”采访攻略 张哲 / 230

突发新闻的长期经营

——“坪石监狱紧急大转移”的采写体会 贺信 / 239

现实的困境和媒体的选择

——谈黄静案报道 王雷 / 243

《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天地广阔

——我写重庆钉子户报道的两点体会 袁小兵 / 249

第一章

为真相我们一直在路上

这是来自新闻第一线的“作战报告”。一次重大新闻事件的调查报道，对于记者来说，无异于一场重大战役。采访过程中有怎样的艰辛与精彩，有多少执著与无奈，“潜伏富士康”、“77元廉租房”、女教师卖身供弟上学、山西黑砖窑采访等诸多报道的全程记录，将告诉你，记者是怎样的小心求证、步步为营。为真相，我们一直在路上。

“潜伏富士康”报道出台始末

●傅剑锋

新闻人所追求的卓越之事，莫过于做一名引领者。但现实中更多时候，我们可能沉浸于痛苦中，追逐热点，疲于奔命，老调重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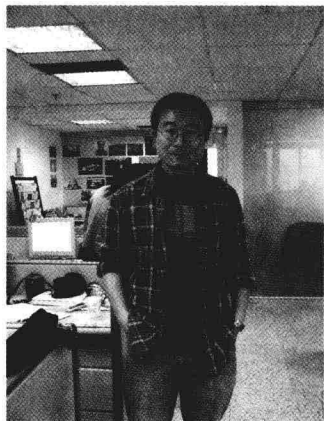
在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事件的报道上，《南方周末》算是相对成功的。但《南方周末》在许多新闻题材上，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我想以富士康的报道为例，来探讨新闻竞争中的一些成败要素。

—

这里说的引领者不是指碎片化信息的第一个发布者，而是指那种最接近全面真相的阐述者。它所呈现的事实与判断，因揭示真相与真问题本身的魅力，而被其他媒体追随、仿效，被舆论反复解读。

那么，这个意义上的引领者，必然和它在纷繁复杂的信息碎片中提炼特征、辨析方向的判断力直接相关。

当富士康员工在2010年3月出现连续自杀时，我就开始思索，它为什么会连续发生？它与富士



康的管理、企业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与新一代工人的命运之间存在隐喻或因果吗？

在这个悲剧的时代，同样的悲剧总是反复出现，不管是矿难、血拆，还是自杀。一个普通民众可以选择麻木与失语，但一个媒体人可能就得追问，不断地推翻成见，去寻找更加有效的观察角度与解释工具。

在这方面，给我启示最大的是新闻部总监郭光东。在江苏东海自焚血拆报道因外部原因受挫后，他就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做单一个案？我们有没有可能总结类似的个案，找到一种趋同的东西？结果，发现血拆之后，官员极少被问责是一个还没被人挖掘过的重要特征。正是在这种提炼的基础之上，有了《员果然个个还在》的《南方周末》头版

在思考富士康时，我也在想，如何超越那些零碎的个案报道，死者与生者，他们到底有着怎样被舆论忽略又事关根本的真相呢？

不能不说，在进行这一思考时，香港社会学者潘毅的《中国女工》一书给我提供了养分。对许多问题的观察，我们只有站在专业研究者的肩膀上，才可能看得更远。

潘毅为了做这个学术研究，在深圳一家电子厂以女工身份打了一年工。她概括出中国女工身上的三座大山：权力、资本和家庭。她描述了机器异化下的女工们的无意识挣扎、重压下的尖叫和梦魇……感慨之余，我不由羞愧，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在国内的新闻报道中，看到过如此清晰、血肉丰满的中国女工形象？为什么描述中国女工的真实生态，居然不是由新闻报道，而是由一本学术著作来完成？

我只能说，不少媒体人，包括我本人，长期处于浮躁的信息生产中（像王克勤那样能沉得住气深入调查的记者太少了），有时反而迷失了对一些基

本问题的关注与沉潜心态。

如“蚁族”与北京唐家岭，这么一个忧虑深重的社会现象，云集京城的诸媒体，包括南方周末，都没有发现，而是由一位踏实又敏锐的学者首先发现的。

这说明，即使你有最卓越的判断力，如果没以沉潜之心研究问题，这种判断力也是凌空蹈虚、徒有其表的空壳。我有没有可能让自己慢一点？我们的报纸有没有可能慢一点，像《中国女工》那样，以沉潜之心去描摹、探究中国工人——这个时代的基本力量之一？

在搜索了不少富士康工人的资料后，我愈加认为，这种尝试是值得的。被国外观察人士所概括的“中国模式”，很大一部分就是靠“世界工厂”支撑的。所谓“世界工厂”，其实就是利用中国低成本的资本要素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为国际工业资本代工。富士康作为有80万人的全球最大的代工厂，显然有足够的样本价值。

《中国女工》的调查方式也启示我，对这个失语的巨大群体，体验式报道或许是最好的。富士康的安保措施与封闭性闻名媒体圈，以打工者身份潜入富士康，也是了解自杀之谜的不得已方法。

我在一次周会上介绍了这一设想，报社领导对这一选题无一例外地表示支持，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投入的重要选题，派记者做一个月以上暗访的设想也获批。

二

我虽然认为一个新闻人的判断力至关重要，但我又对它保持警惕。当一个媒体人对判断力过度自信，往往也就会变成偏见与成见，发现真相的眼睛就会被蒙蔽，所谓引领者一说也只能流于空谈。判断必须要随着调查本身的变动，不断地修整，甚至是推翻。调查富士康员工自杀之谜就经历了这样的冒险历程。

富士康招的普工年龄普遍在18—23岁之间，南方周末没有如此年轻的记者，武汉大学的实习生刘志毅毛遂自荐，在做了全面的安全设计防范（如外部的安全呼应、不进有毒高危车间工作的前提）后，他以普工身份潜伏进富士康，在2010年4月11日后成了一名仓库保管员。

公开采访与主笔的记者是杨继斌。他是一位出色的调查记者与特稿记

者。更重要的是，他对富士康这个选题有激情、有冲动、有想法。

确定选题几天后，分别又有三名富士康员工在4月6日、7日跳楼，“六连跳”触目惊心。

杨继斌也在4月11日后开始在深圳采访。我们的思路是要去寻找诸多自杀背后的“血汗黑幕”，然后再以这些黑幕来折射富士康工人、新生代打工者的更为普遍的生态状态。

其时，不少报纸也开始调查连续自杀谜团，认为自杀是军事化管理、严苛的等级制度、过劳的加班时间所致，但没有严密的证据链作证。直接原因是采访难度太大：警方不愿说、富士康能透露的东西极有限，家属又只有一面之词而缺乏证据。

我们有“潜伏者”，当时还认为揭黑会胜他们一筹。开始的一周，杨继斌不断地采访“六连跳”的知情者与家属，刘志毅也试图在厂内探寻自杀的可能秘密。但十余天后，我们发现，多数自杀的直接原因都非常私人化（如婚恋、家庭变故等），与富士康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很难建立。刘志毅的暗访还发现，富士康的用工制度，相对于其他多数代工厂，不管在工资、福利还是管理规范上，仍优于它们。但直觉告诉我们，这些工人的自杀应是与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工作强度相关的，与新生代打工者更为普遍的生存状态也应是相关的。

这种相关性的证据在哪里？我和杨继斌都陷入了困境，在电话中反复讨论后仍无果。我意识到不能再固执己见，需要转变思维方式。

但如何转变呢？在《中国女工》一书中，潘毅通过学理的演绎，发现一个女工经常性的梦中尖叫，甚至痛经，都是她反抗机器压迫的一种方式。那在解释自杀与富士康之间的关系上，有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学理演绎？

我到了深圳，决定与杨继斌一道，约刘开明博士聊聊。刘开明是对中国产业工人有良好实证研究的学者，我希望他能为我们解开思维方式的死结。

没想到，这个困扰我们的问题对刘开明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像富士康这样的连续自杀，他一点也不感到惊奇，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他说，表面上看，不少自杀各有其因，但实际上还是与富士康深刻相关。微观方面，富士康的12小时工作制已经异化了工人的整个感觉系统。他们的生活单调到除了面对机器，就是睡觉。人际交往的时间、娱乐的时间都极有限，维系他们作为人的社会关系、情感维度都因此变得非常单薄与脆



南方周末潜伏全球最大代工28天，探寻新生代打工者的死与生
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

子，长期被超经济剥削，工资低廉，只能勉强养活自己。户籍制度、高房价把他们挡在了城市化之外。但又由于他们是失去了土地或不会种地的民工二代，以后回不去农村，他们前无进路后无退路……所以，这个群体有着强烈的孤独感、无助感、焦虑感和被机器压榨后的脆弱感。而富士康又组建了世界工业史上都没有过的巨大的工业园区与居住区，人长期处于这种环境和气

场中，出现自杀和自杀氛围的传染都是可以想象的。

刘开明的学理分析，使我们找到了个体自杀与群体命运之间的深刻关联性。先前非要找个“黑幕”的想法也改变了。转而去寻找造成自杀事件的那些多样化的资本、机器、权力、制度的现实细节。正是这种种细节，这种种看似不确定的要素，汇流成摧毁那些自杀者生存意志的原因。我们要揭示的不是自杀与富士康之间非黑即白的因果关系，而是自杀与富士康、与整个不合理社会机制之间潜藏又必然的关系。

思维方式转向后，千水万山豁然见。刘志毅在潜伏期间发送回的手机信息，也在印证这一判断。

这里不能不赞一下刘志毅作为一名观察者的深入与勤奋。他在28天的潜伏中，共发了3万多字的手机短信给杨继斌。当他出来的那天，杨继斌发现自己的手机“杯具”了，整个软件系统都崩溃了，估计是接短信接累的。

这里还需说一下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对重要的采访，编辑最好不要坐在办公室里空想。遇到困难时应到现场，与记者并肩战斗，解决问题的灵感与方法才能不断被碰撞出来。我想，如果我不去深圳这个现场，可能不会那么快与记者一道解决这一难题。

弱。他们常常需要靠极为有限的情感关系与社会关系才能抵抗机器异化，暂时获得人生快乐。一旦情感、家庭等社会关系受挫，他们的生存意志就极易崩溃。宏观方面，这个新生代打工群体，没有独立的工会维护他们的权利，也没有其他像样的自组织，人与人被权力与资本分割成一个个孤独的原

事态的恶化超出我们的想象。就在采访尚未结束的5月初，富士康员工卢新又跳楼自杀。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立即决定，把整个报道计划提前。同时，我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们应该直接采访富士康高层。这个决定的依据是，发现富士康在舆论压力之下表现得开明了一些，我就赌不会有被打压的风险。

果然，富士康高层表现出了开明姿态。从新闻办主任刘坤，到行政总经理李金明，都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说了他们的看法，还同意让摄影记者王轶庶进入厂区拍照，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图片。

报道的信源因此变得更为多样与客观。我和杨继斌对整个报道的写作框架也达成了一致：以生写死，以死写生，探讨新生代打工者的死与生。

令人痛心的是，富士康此后发生了“13连跳”。尽管郭台铭迫于压力提高了工人基本工资，但如若针对中国工人的整个资本、社会、政治的制度体系不改变，我仍难以乐观。况且，还有更多比富士康更差的代工企业，还没有被媒体关注。事后来看，这个报道在采编上，仍是有些缺陷的，如观察的方法相对单一，除了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观察方法，还应该用经济学的视角作分析。如果这样，可以找到新生代打工者命运与全球资本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潜伏手记，处理应更节制一些，让更多的事实、而非情绪来说话。采访一开始，我曾想请记者去揭开富士康保安人员的种种问题，因为不少人对自杀事件与保安人员之间的关系也有怀疑。但由于其保安群体的警惕性与封闭性，使我们难以接近这个群体，这方面的疑点仍未解开……

但报道推出后的反响，仍是卓越的，并戏剧性地让“潜伏富士康”成为同行们的效仿方式，据说近日前后已有逾百名记者以打工身份进入过富士康。这一次报道，仍难脱诸多偶然性的机缘相助。一个新闻人，要想在更多的涉及社会重大命题的报道上超越同行，我认为仍需依凭于判断力和创造力的不断提升，依凭于对真相的谦敬，更依凭探究真问题的沉潜之心。

我想起诸多报人在这方面的雄心和价值观上的自信自励。记得程益中曾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我不是一般的高，我是超出人群的高……我不关心怎样去追赶人家，我只关心怎样让人家追着我跑。”这是一种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境界，它值得我与同道诸君去追寻。

（作者时为南方周末资深编辑）